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

张卓元 高培勇 主编

厉以宁 学术自传

厉以宁◎著

ACADEMIC
AUTOBIOGRAPHY

OFLI
YINING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厉以宁

江苏仪征人，
1930年生于南京，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



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甚丰，并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希腊古代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

张卓元 高培勇 主编

厉以宁学术自传

厉以宁◎著

ACADEMIC
AUTOBIOGRAPHY
OF
LI
YINING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厉以宁学术自传 / 厉以宁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20.2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

ISBN 978-7-5454-6815-1

I. ①厉… II. ①厉… III. ①厉以宁—自传 ②经济学—文集
IV. ①K825.3 ②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4056号

出版人: 李鹏

责任编辑: 周晶

责任校对: 李玉娴 谢善德

责任技编: 陆俊帆

厉以宁学术自传

LIYINING XUESHU ZIZHUAN

厉以宁 著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2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6815-1
定价	88.00元

广东经济出版社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图书营销中心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 (020) 87393830 邮政编码: 51007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胡志海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张卓元 高培勇

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白重恩 蔡 昉 曹远征 常修泽 陈东琪

陈锡文 迟福林 高培勇 郭克莎 黄群慧

贾 康 金 碚 李 实 李晓西 李 扬

厉以宁 林毅夫 刘世锦 刘 伟 彭 森

钱颖一 宋晓梧 田国强 魏礼群 吴敬琏

张 军 张军扩 张燕生 张卓元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 分册名录

(按姓氏音序排列)

- | | |
|---------------|---------------|
| 1. 《白重恩学术自传》 | 24. 《刘世锦学术自传》 |
| 2. 《蔡昉学术自传》 | 25. 《刘树成学术自传》 |
| 3. 《常修泽学术自传》 | 26. 《刘伟学术自传》 |
| 4. 《陈东琪学术自传》 | 27. 《马建堂学术自传》 |
| 5. 《陈锡文学术自传》 | 28. 《彭森学术自传》 |
| 6. 《迟福林学术自传》 | 29. 《宋晓梧学术自传》 |
| 7. 《樊纲学术自传》 | 30. 《田国强学术自传》 |
| 8. 《范恒山学术自传》 | 31. 《王梦奎学术自传》 |
| 9. 《房维中学术自传》 | 32. 《王一鸣学术自传》 |
| 10. 《高培勇学术自传》 | 33. 《魏杰学术自传》 |
| 11. 《高尚全学术自传》 | 34. 《魏礼群学术自传》 |
| 12. 《郭克莎学术自传》 | 35. 《乌家培学术自传》 |
| 13. 《洪银兴学术自传》 | 36. 《吴敬琏学术自传》 |
| 14. 《黄达学术自传》 | 37. 《杨瑞龙学术自传》 |
| 15. 《黄群慧学术自传》 | 38. 《张军学术自传》 |
| 16. 《贾康学术自传》 | 39. 《张军扩学术自传》 |
| 17. 《江小涓学术自传》 | 40. 《张晓山学术自传》 |
| 18. 《金碚学术自传》 | 41. 《张燕生学术自传》 |
| 19. 《李实学术自传》 | 42. 《张宇燕学术自传》 |
| 20. 《李晓西学术自传》 | 43. 《张卓元学术自传》 |
| 21. 《厉以宁学术自传》 | 44. 《赵人伟学术自传》 |
| 22. 《林兆木学术自传》 | 45. 《郑新立学术自传》 |
| 23. 《刘诗白学术自传》 | 46. 《周叔莲学术自传》 |

总 序

P r e f a c e

盛世出华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变革，也将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瑰丽篇章。中国经济学家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或贡献了智力，或参与了实践，无论是参政建言还是学术构建，均厥功甚伟。

在我们先后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为了记录并彰显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挥智慧的力量和作用，同时借以勉励后学筑梦前行，我们组织并编辑了这套《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

这套丛书的出版设想，最初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提出。在此之前，得力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教授等的大力支持，该社曾于2009年编辑出版《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丛书。那套丛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弹指一挥间，又是一个十年，共和国迎来了70华诞，改革开放也逾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广东经济出版社邀请张卓元教授和高培勇教授领衔，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具体负责，组织、编辑一套集中反映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探索和心路历程的丛书。

认识到这是一件颇具眼光、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便

有了读者眼前这套《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启动。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从这些灿若繁星的经济学家中推选出大家比较公认的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并不容易。怎样推选？推选多少？具体标准是什么？如何约稿？丛书的体例又该如何把握？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接二连三地提至我们面前。

为此，在初步拟订编辑出版方案的基础上，由张卓元教授和高培勇教授主持，邀请部分专家召开了小范围的论证会议，就组建丛书编辑委员会以及丛书编辑出版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听取意见，进一步完善方案。

紧跟着，2017年6月25日，丛书编辑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共有19位（按姓氏音序排列）：白重恩、常修泽、陈东琪、陈锡文、迟福林、高培勇、郭克莎、黄群慧、金碚、李晓西、刘伟、彭森、宋晓梧、田国强、魏礼群、吴敬琏、张军扩、张燕生、张卓元。因故请假、提供书面意见的委员有10位（按姓氏音序排列）：蔡昉、曹远征、贾康、李实、李扬、厉以宁、林毅夫、刘世锦、钱颖一、张军。

这次编辑委员会会议就如下一些重要问题形成了高度共识：

第一，关于丛书的意义。委员们高度认可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认为这是一项富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出版工程。

第二，关于丛书入选者的标准和数量。委员们认为应本着宁缺毋滥、质量为先原则，以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某个特定

领域做出实质性贡献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经济学家为重点，入选者宜掌握在60位左右。

第三，关于丛书的体例。基于凸显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考虑，委员们认为学术自传宜涵盖作者的学术成长历程、作者对改革开放事业某个特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作者对特定领域改革前景的展望等方面内容。

第四，关于丛书的读者对象。委员们认为应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以及学生，谈人生经验、述理想情怀，激励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确立奋斗的目标、发展的方向和成功的路径。

第五，关于丛书的文风。委员们主张学术自传应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学术性，同时文笔流畅、深入浅出，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在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的候选经济学家名单基础上，与会委员按照获得半数以上多数票入选的规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确定了65位入选者。

会议还决定，请因故请假的委员继续对候选经济学家名单通讯投票，并根据此项流程的统计结果，提请全体编辑委员会委员再进行一次通讯评审，最终确定丛书入选者为68位。

由此产生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入选作者为（按姓氏音序排列）：白重恩、蔡昉、曹远征、常修泽、陈东琪、陈清泰、陈锡文、迟福林、樊纲、范恒山、房维中、高培勇、高尚全、郭克莎、郭树清、韩俊、洪银兴、华生、黄达、黄群慧、贾康、江小涓、金碚、李剑阁、李京文、李实、李晓西、李扬、厉以宁、林毅夫、林兆木、刘国光、刘鹤、刘诗白、刘世锦、刘树成、刘伟、隆国强、楼继伟、马建

堂、彭森、钱颖一、宋晓梧、田国强、王梦奎、王一鸣、魏杰、魏礼群、乌家培、吴敬琏、吴晓灵、杨启先、杨瑞龙、易纲、余永定、张军、张军扩、张维迎、张晓山、张燕生、张宇燕、张卓元、赵人伟、郑新立、周其仁、周叔莲、周小川、朱玲。

在确定入选者名单之后，《经济研究》编辑部立即展开了组稿工作，共有46位入选者接受约稿。在这一过程中，入选的经济学家或其家属、秘书、好友等，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百忙之中积极准备所需要的文献，其认真精神令人感动。应该说，没有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这套丛书是难以按时按质完成的。

由于入选的经济学家大多是名人、忙人，有一部分老作者也已年届九十高龄，约稿的工作量及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些作者提出暂不能写作，这多少令我们感到些许遗憾。其间也有许多感人的情景要告诉读者们：常修泽先生于2018年夏天在吉林延边的一个小镇闭门两三个月专事自传写作，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数十次与编辑部和出版社沟通，包括内容完善、结构设计和一些合理性建议等诸多细节，并且在约定期限内交稿给编辑部；九十五岁高龄的黄达教授在写作过程中十余次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编辑部讨论写作重点和风格；乌家培、林兆木、王梦奎等老先生也是不厌其烦，反复就文字沟通润色；周叔莲先生在去世前一周还给编辑部打电话，告诉编辑自己已经基本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感想，我们至今忆此仍为之动容。在这些难得的沟通中，我们一次次被感动。

随着此套丛书的陆续编辑出版，我们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系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知名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这套自传体丛书，是对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学术贡献、成长历程及人格魅力的一个集中展示。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了解我国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机会。

这些经济学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是佼佼者或领军者，他们学术素养深厚、学术成就卓越。他们在自传中大多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讲述了自己的家国情怀与学术成长经历，为记录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从经济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

众多大家的纸上风华，既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经验比较系统的总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应该说，本套丛书的作者们用生动而精彩的人生与学术追求，践行了这一重要要求。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与《经济研究》编辑部各位同仁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们通过电话、短信和邮件等方式不断地与作者

或其家人、秘书等进行沟通。参加组稿和审稿工作的人员有：郑红亮、刘霞辉、张永山、唐寿宁、王利娜、谢谦、金成武、孙三百、陈小亮、欧宏、王红梅、刘莹、曹帅。

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在本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才能得以顺利与读者见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套组织工作浩繁的大型丛书，见证了《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广东经济出版社值得称道的团队合作精神。编辑部的张永山、王红梅同志和广东经济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从始至终为丛书的组织沟通、约稿、文稿整理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的耐心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令人称道。

这套丛书就此付梓了，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岁月，携手丛书作者对祖国的拳拳心路与期待，我们略感欣慰！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9年10月

厉以宁

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至2002年任第七届、第八



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至2012年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同志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他还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

厉以宁同志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任职期间，还参与推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以及《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新36条”）的出台。在担任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期间，积极参与并推动毕节的扶贫改革。另外，厉以宁同志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厉以宁同志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希腊古代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主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目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诗情原在淡云中 / 1

——1988年经济改革的几件大事

第二章 晚风低诉旧时情 / 21

——20世纪90年代前期湖南、河南考察记

第三章 红楼旧影，未名新曲，桃李满园栽 / 45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建立

第四章 人世从无平坦路 / 69

——记证券法起草工作以及证券法的通过

第五章 下乡怨，下海恋，下岗愁 / 91

——就业优先论的提出

第六章 人情道德一楼中 / 109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的出版

第七章 雨停始见莺飞，花开全赖风微 / 135

——论有为出自无为

附 录 / 153

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 / 154

中国发展需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 171

结束语 / 179

后 记 / 185

前 言

我是1951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在来自湖南考区的众多考生中，北京大学经济系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在大学阶段，要选择外语课。通过测验，我选择了“大二英语”班，作业任务很重，有英译中，也有中译英，好在我中学时英语基础比较扎实，都能通过。当时我们仍在城内红楼上课，如政治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等都是重点课，也是打基础的课，所以不敢松劲。

1952年夏季，开始院系调整，各人选志愿。凡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迁到西郊燕京大学校舍，因为燕京大学并入北大了。选择财政、国际贸易、会计、统计、金融的，则并入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专业。

我选择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这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以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为事业。毕业后我留校担任资料员，任务是帮助周炳琳教授整理资料。俄语是我在大学阶段自学的，经过3年多的刻苦学习，到我任资料员时，系里给我的任务是翻译苏联学者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该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后20多年，我一直从事资料翻译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外国经济史一课的周炳琳教授病重，

住院治疗无效，不幸去世。他临终前，我到医院探望他，他说：“看来外国经济史一课的担子要让你来挑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承担了外国经济史的教学任务。由于讲课受到学生欢迎，我被提升为讲师，但我的工资没变，仍是每月60多元。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先是在经济系接受监督劳动，后来又被关进“牛棚”，然后又随着北京教职员到江西鄱阳湖边和北京大兴县（现为大兴区）农场劳动了两年。



① 1961年10月，赵迺铨教授（厉以宁的老师）和厉以宁在北京大学。

我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发表过几篇有关外国经济史的论文，这使我稍感安慰——我总算没有浪费时间。

1973年起，胡代光同志担任经济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他认为我作为资料员可以提供国外经济学界的新信息，供经

济系教师参考。于是，我一个人在经济系资料室担任编辑《国外经济学动态》的工作，大约每个月刊出一期。《国外经济学动态》前后出版了40期左右。这些出版的资料成为当时多所高校从事经济研究的重要参考。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接着邓小平同志复出。从这时起，我才有机会对中国经济改革发表自己的见解。从1978年开始，我有关改革和开放的想法才有机会陆续发表。这本自传的内容就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第一章

诗情原在淡云中

——1988年经济改革的几件大事

一

1987年年终，有一天上午，我在家中看书，忽然接到学生打来的两个电话。一个学生告诉我：“厉老师你已经被列为北京市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了，选区是北京市丰台区。”另一个学生说：“今天上午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厉老师你已经被湖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学生的消息都是真的。但一个人怎么会同时被列入两个不同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名单呢？一了解，原来湖南省选区的候选人资格是中央提名的，北京市的候选人资格则是选民自发提名的。经过协商，最终以湖南省选区为准。从这一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以后第八届、第九届我都是湖南省选区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共15年，即从1988年到2002年。2003年，我由全国人大代表转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即第十届（2003—2007年）、第十一



① 1988年6月，厉以宁在批改学生的论文。

届（2008—2012年）、第十二届（2013—2017年）。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和全国政协委员三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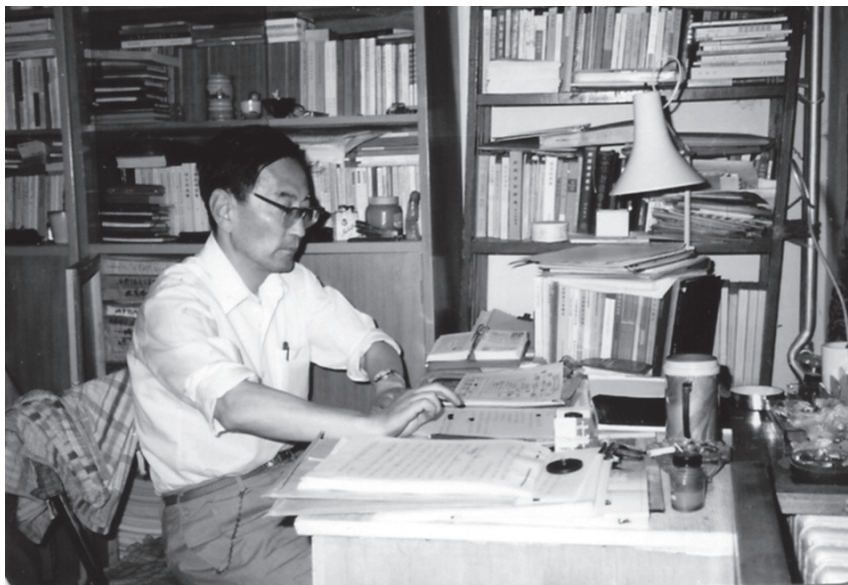
的任期加在一起，1988—2017年，一共30年。

我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的教授和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的教授，讲课、带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进修教师、参加各个课题研究，还有出国短期讲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这都是我的分内工作，不能不负起责任。此外，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还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包括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分会主任、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主任由校长丁石孙兼任）等。这些工作一个也没有减少。所以我当时就想，趁现在我年纪还不算大（1988年，我的年龄是57岁），既然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就一定要做到校内校外工作兼顾，才能不辜负社会和学校师生对我的期望。

1988年3月初，第七届全国人大开幕了。我到湖南代表团报到。湖南代表团住在德胜门外马甸的湖南省驻京办事处的招待所内。报到后遇到两位北大校友：一位是哲学系毕业生李泽厚，他1954年毕业，比我高一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很有名的哲学研究专家了。另一位是历史系毕业生张忠培，他1956年毕业，比我低一届，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院长。李泽厚和张忠培都是湖南人，所以在湖南选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并非湖南人，而是江苏人，为什么我被列入湖南选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呢？据我猜测，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全家逃难到湘西，在沅陵住了几年，在那里上学，我自己常说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另一个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是在沅陵参加工作，先是在沅陵县教育用品消费

合作社做会计，后被调到沅陵县修建委员会当事务员，并在那里参加1951年的高考，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在湖南代表团内一些代表打趣说：“你是湖南的女婿，当然可以列入湖南选区！”这倒是事实，因为我妻子何玉春是湖南沅陵人。但不管中央是怎样考虑的，既然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那就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两次选举过程。一次是选举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员，我被选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另一次是选举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也被选上了。这样一来，我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每隔两个月就要开一次，每次通常一个星期。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会议也很多，包括审查预算决算，讨论代表们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议案建议，



① 1985年11月，厉以宁在家中写作。

此外还有其他事项。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委员这样忙碌，而校内的工作也丝毫没有减少。但既然已被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的重任，再忙也得把工作做好。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校内的教学、行政和研究工作，同样不能放松。那时，我在校内的课很重，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发展国际比较（这些是大学生的课程），还有西方经济学流派、国际金融学说史专题、经济史专题（这些是研究生的课程）。

同时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教授还有朱德熙先生和胡代光先生，胡代光先生还被选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我们三人经常一起坐轿车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和朱德熙先生同坐一辆轿车往返，是我向朱德熙先生请教的好机会。朱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向他请教有关唐诗宋词中的音韵难题，学到不少知识，受益良多。不妨举三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吴语和古诗韵的关系。以前我读古诗词时，经常感到以吴语读诗词是押韵的，但不了解吴语为什么会押韵。经过朱先生的点拨，我才了解到吴语是古代方言，在江南一带早已流行，而南朝的诗作多以吴语朗读，所以非常顺口。后来，我还专门到江苏高淳县（现为高淳区）调查当地方言（古吴语）的特色，很有收获。另一个例子是对入声字的认识。朱先生说，这在粤语中是最清楚的，入声字是带尾音的（如p、t、k）。如粤语中，孙逸仙中的“逸”，是入声字，读yet；石头的“石”是入声字，读shek；角落的“角”是入声字，读kok；等等。后来的北京

语，没有带尾音的字，所以也就没有入声字了。第三个例子是：为什么“三”和“山”不同韵？朱先生说，唐宋时代，汉字中有n结尾的字和m结尾的字。“三”字是以m结尾的，读起来是“sam”（三姆）；“山”字以n结尾，读起来是“shan”，当然与“sam”不同韵。又如“林”字，在福建话中还是古音，读起来是“lam”，而不是“lin”或“lan”（“林”或“兰”）。由于两人都坐在小轿车上，一问一答很简快，但朱先生的指点的确给我不少启发。可惜的是，朱先生身体不佳，不久就因病谢世了。

第七届全国人大从1988年3月第一次全体会议到1993年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十四次常委会会议结束为止，整整五年，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所以人们常说，第七届全国人大这五年是不寻常的五年，令人难以忘怀。

我根据自己当时的工作日记，分成以下四个问题来概括地追述。这四个问题分别是：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价格闯关的尝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意见以及对股份制和市场经济的批判、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再度形成高潮。

（一）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

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前，有关三峡工程的利弊得失，以及在当前国家财政如此困难时期是否值得花这么多资金投入这项耗资巨大的水利工程，等等，是有不少不同意见和看法的。所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后，在全国人大各个组的会议上，争论也就展开了。

我是湖南代表团的成员，而湖南又与长江的洪水泛滥直接有关。沿洞庭湖各县市的城乡居民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湖南代表团的全团大会上和各个分组讨论会上，我仔细听了代表们的意见。总的倾向是：代表们都拥护政府投资兴建三峡工程。一些住在洞庭湖区（如华容、南县、安乡等县）的农民代表无不为每年的江防湖防叫苦不已。他们说，为了堤防，一年四季不得安息。冬天，省里、市里、县里早早就动员农民自带铁锹、扁担、箩筐、被褥、口粮上堤，把堤防修得再高一些，再结实一点，直到春节前才准回家。开春后，如果碰上桃花汛，又要上堤防守，提心吊胆，生怕江水湖水漫过大堤，淹了洼地的民居。夏天，农民不仅要忙于稻田的除草，收割早稻，抢种晚稻，还要担心大汛来临。如果川江及其支流洪水暴涨，一过湖北荆州，湖南洞庭湖区就要遭殃了，怕低洼地的民房被洪水淹没，男的全上堤了，女的、老的、小的都躲到大堤上，在那里住下，做饭吃，并且一有险情，时刻准备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遇到多年一遇的大洪水，为了保证武汉等沿江工业城市不受损失，荆江分洪，洪水就直灌湖南洞庭湖区一些县乡，农民就会颗粒无收，只能靠政府发救济粮为生。牛是宝贵的，牛不能被冲走，农民牵着家里的牛，住在大堤高处，天天盼着水退，水退后再修补残破的民房。秋收也是能收多少算多少了。秋收完毕，快到冬天了，沿湖各县乡的农民又接到自带铁锹、扁担、箩筐、被褥、口粮修堤的命令，上堤了。年年如此，湖区的农民苦不堪言。

所以湖南代表团在讨论要不要投资修建三峡工程时，会上几乎只听到代表们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呼声。有的小组还传来农民代表的呼声，说：“再不下决心修三峡工程，难道今后年年都这样提心吊胆在湖区过日子，一年四季都挑土修堤？”

在人民大会堂里，其他代表们的反应却不一样。有些代表从经济的角度发表看法，认为要修建三峡工程，川江一段的农田会被淹没，从重庆到湖北宜昌会有大量移民迁移，这将是一件大事，如果缺乏安置措施，将成为今后的一个大麻烦。说这些话的代表并不是反对建三峡，而是认为必须统筹安排，才不致社会动荡。有的代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三峡工程的资金筹集问题。他们认为，三峡工程投资太大，如今改革开放刚开始，经济实力还不足，一旦项目启动了，这样一笔债务怎样偿还？有的代表提出，把三峡工程搁置几年，抓紧时间先建设金沙江以上的规模较小的工程，既可以积累经验，又可以解决长江下游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这些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在湖南代表团内却一直是赞成三峡工程赶紧上马的。我认为，无论从解除湖南、湖北两省水患的角度看，还是从缓解长江下游电力供应紧张的角度看，三峡工程建设都不宜久拖不决。但要周密安排，有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并妥善地安置移民。三峡工程的兴建已到了该断即断的关头，再拖下去，是白白浪费时间。这就是我当时的立场。

至于另一种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意见，主要来自环境学界的一些专家，他们担心三峡工程的兴建会给这一带的气候

带来无法预料的变化。我的看法是：环境学界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但国际上修建大坝的案例值得我们参考和进一步研究，这并不能成为搁置三峡工程的理由。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要继续进行，不能停顿，但三峡工程不能搁置，否则时机的耽误和前期大量资金的支出岂不是巨大的损失？我私下对一些研究环境问题的友人说：我就不相信修一个大坝会使四川到湖北这一带的气候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还是让今后的时间来检验吧！

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终于由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这是我和许多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代表深感欣慰的。

（二）价格闯关的尝试

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新一届政府产生，李鹏任总理。李鹏在担任总理后提出要加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开始将近10年的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前，更不能半途而废。问题在于：怎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还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首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包括我在内的一批重视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都主张通过产权清晰化和明确投资主体，使国有企业走上股份制道路，从而形成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我们认为这是建立市场经济（当时仍使用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的必由之路。

我当时是湖南选区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属于湖南代表团。湖南省的党政领导，如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省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等人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和

我在一起，朝夕相处。熊清泉同志好几次向我提出：“回湖南看看吧，帮家乡出主意，让湖南的经济发展快一些。”陈邦柱同志也说：“给湖南省的干部做几场报告，我看这是加快湖南发展的重要条件。干部思想保守，还能改变湖南面貌吗？”盛情难却，我答允放暑假就回湖南走走，因为放暑假前，我在北京大学有课，还有一些研究生要进行论文答辩，实在忙得没有时间。

正值夏初，北京和一些较大城市忽然传开了马上就要放开价格，进行价格改革的流言，于是这些城市掀起了抢购必需品和高档消费品的浪潮。大百货公司里挤满了居民，都在抢购衣料、时装、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或其他家用电器。金首饰也是居民热购的物品，都说黄金能保值。稍后，连小杂货店也有居民去抢购了，抢购物品包括肥皂、洗衣粉，甚至食盐。居民之间相互告知，把人民币放在家里不买东西，等价格一放开，不是净吃亏吗？

一些学生告诉我，甚至农村也有抢购商品的现象。但学生又说，农民手头没多少现金，所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派了三名工作人员专程来北京我家，接我去湖南讲学和考察。那时我住在北京大学中关村宿舍区，我们家有70平方米建筑面积，包括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客厅。他们就问：“您就只有这三个小房间？”我说：“是的，北京大学的宿舍就是这么紧张。”

我们坐火车到了长沙。一了解，抢购之风似乎暂时停息了，据说国务院有领导宣布价格放开是谣传，但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群众情绪依旧不稳定。我应邀在湖南长沙给省

委、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讲了两次课。主要观点依然是经济改革的思路，即我一贯主张的要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思路。我带了四名年轻教师同行，他们是：孙来祥、李其、罗知颂和王跃生。他们上午听我讲课，下午到湖南省委党校学员宿舍回答学员的疑问。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黄道奇同志见这四位年轻教师业务和工作能力都不错，问我能不能将其中两位调到湖南省工作。我说，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因为他们都有家室，愿不愿意调来湖南，需要由他们自己决定。后来听说黄道奇同志找他们谈过，但没有成功。

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是十分赞成股份制改革的思路的。他对我说：“你到湖南各地走走，看看省属国有企业中有没有合适的，选几家作为试点如何？”我说，先考察一两家国有企业，再拟计划吧。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对股份制改革的争议仍很大，还需要中央先做出决定，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才能够展开。

看来，价格闯关受到群众性抢购风潮的干扰，很难铺开，而股份制改革仍有争议，所以我带着四位年轻教师只好以如何加速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课题了。

我们先到岳阳市、湘潭市进行考察，再到常德市考察，然后从常德市向湘西进发。这样就回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生活和学习过的沅陵县。沅陵在抗日战争后期是湖南省政府所在地。日军只攻占了常德和桃源，没有跨越雪峰山脉。沅陵是大后方，日本军队未能进入。

在路过桃源县时，我们游览了风景区桃花源。我写了一首《七古·游桃花源》。

七古

游桃花源

一九八八年

少小熟背王维句，
有幸曾在桃源住。
只住县城未上山，
不知洞口在何处？
今日进山却茫然，
亭阁楼台古树间。
虽有桃花夹溪岸，
溪小水浅怎撑船？
沿溪探寻未见洞，
纵见小洞仅狭缝。
洞中难有天外天，
更无遗民辟家园。
归来恍然有所悟，
陶公遗篇如迷雾。
武陵未必有仙山，
灵境不在凡尘路。
桃花流水一年年，
月儿残缺月又圆。
细雨斜风燕来去，
心宽无处不桃源。

诗中，最末一句“心宽无处不桃源”，是我之后经常赠给友人的诗句。

从桃源往西，逐渐进入山区，汽车穿过沅江大桥，进入阔别37年的沅陵县城。我们下榻于校场坪的宾馆内。校场坪原来是山上的一块平地，过去是枪毙犯人的地方。现在，五强溪水电站即将落成，届时沅江涨水，老城区将被淹没。新城区在校场坪周边的山上，新楼正在兴建中。趁老城区尚未被淹掉，我们一行沿着沅江北岸，走过河街，先到了何玉春家的旧居，又到了太常村我家的旧址，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盖起的临时房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房屋都被拆掉了。

沅陵县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相当繁华的。没想到最近这些年因修建五强溪大堤，沅江水涨，沅陵旧城即将被淹没，所以旧城区的居民都往后山上迁移，旧城区的破破烂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沅陵县经济落后，成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省、地区、县三级政府不重视发展经济而单纯靠国家拨款救济有关。

离开沅陵县以后，我们一行到了吉首，再由吉首转到张家界。当时张家界是一处新开发的风景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区，没有人敢到这里来，美丽的风景也不为外人所知晓。我们一行，包括陪我们来湘西考察的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过去也不曾来过张家界。

在张家界，我填了一首《浣溪沙》。

浣溪沙

张家界

一九八八年

看罢青山旭照红，
诗情原在淡云中，
迎春浅草碧葱葱。

湖海苍茫终有岸，
溪泉涓滴却无穷，
细疏长绕最高峰。

这首词让我把对张家界的印象深深留在心里。词中，“湖海苍茫终有岸，溪泉涓滴却无穷”两句，既是我经常自勉的话，也是我时常赠送给学生的勉励之语。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意见以及对股份制和市场经济的批判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一阵保守的思潮，说得严重些，是一阵想使改革停步的思潮。股份制受到批判，批判者给股份制改革加上了一大堆“帽子”，例如私有化、化公为私、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等。主张市场经济的论点也同样受到严厉批判，认为这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是为资本主

义的复辟做准备，等等。在北京各个高校中，有关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市场经济导向等课程都停开了。

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汪家缪同志和校长吴树青同志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要继续对改革进行探讨，并且还认为像股份制改革、市场经济导向这些问题可以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属于学术争论，学校不干预这类学术探讨。

我仍同以前一样，在大教室内为选修我的课程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上课。我的两本著作，都明确地指出股份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是正确的做法，毋庸置疑。这两本著作：一本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0年初交稿给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90年8月出版；另一本是《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我和学生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合写的，1991年初交稿给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91年8月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前。由此可以了解到北京大学始终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的，学术问题上的争论一直是校方不先做决定，研究者可以自由讨论。后来有人对我说：“你真幸运，没有因此而遭封杀。”我说，多亏北京大学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和新的校长，否则就很难说了。

1990年，我60岁。我填了两首词，聊以纪念我的60岁生日。

一首是《浣溪沙》。

浣溪沙

六十自述

一九九〇年

落叶满坡古道迷，
山风萧瑟暗云低，
马儿探路未停蹄。

几度险情终不悔，
一番求索志难移，
此身甘愿作人梯。

词后有一小注：“这时，作者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的主张，正遭到一些人的批判。”

另一首词是《太常引》。

太常引

无题

一九九〇年

明几斗室小轩窗，
盆菊一枝黄，
灯下写文章。
倍觉是、清秋夜长。

前人功过，
史书难信，
掷笔起彷徨。
惊起鹤飞翔，
早冲出、重重院墙。

（四）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再度形成高潮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暂时被搁置一边，如果不是这次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并发表谈话，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或许还会耽搁若干年。幸运的是，在邓小平这次南方考察和谈话精神的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的内心难以平静。我是1992年1月底得到这个信息的。在1992年1月27日、30日举行的两次北京经济学家高层座谈会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些要点已经悄然传开了。与会者都感到说不出的兴奋，似乎改革的春天已经临近。那年春节是2月4日。春节前两天，我接到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深圳市委的电话邀请，他们希望我到广州、珠海、深圳去做有关改革的学术报告。我欣然应允，2月8日（年初五）就南下了。我先到珠海，再去广州，然后到深圳。短短12天，我连续做了4场报告：珠海1场，广州2场（中共广东省委1场，中共广州市委1场），深圳1场。此外，还在佛山、中山举行了两次以企业家为主的座谈会。我

做报告和在企业家协会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都是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实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来听报告和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会场挤不进去，加了不少凳子，还有站着听的，坐在地上听的。我体会到，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民间蕴藏着改革开放的极大积极性。关键在于邓小平同志的登高一呼，民间的积极性就迅速地被调动了起来。治理中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不依靠民间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从这时起，许多人都预料到一个新的改革开放高潮即将摆在大家面前。大家牢记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一些警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两句至理名言，一下子就在全国流传开了。

又过了7个多月，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开幕。十四大最大的成绩是：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就对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作了一个科学的、权威性的解答。

在1992年春节后去广东讲学和考察期间，我填了一首《相见欢》。

相见欢

在广东佛山、顺德、中山过春节

一九九二年

驱车直下珠江，
细思量，
何故这边常绿那边黄？

创业绩，
人尽力，
任飞翔，
难怪这厢温暖那厢凉！

第二章

晚风低诉旧时情

——20世纪90年代前期湖南、河南考察记



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又是我作为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区。1988年夏天我应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政府的邀请前去讲学，然后专门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后方湘西沅陵、吉首、古丈、永顺和张家界进行了考察。回到长沙后，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湘西早日脱贫致富。我回答得很干脆：明确产权，走股份制改革之路。熊清泉同志笑了，他说他是同意在湖南加快股份制改革的，但中央的态度还不明确，反对搞股份制改革的声音还很大，他们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推进股份制，只能小打小闹。我也笑了。事实的确如此。

1989年10月中旬，我带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到湖南进行调研，主题是环境保护。在长沙，我又见到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道奇同志（原是省委组织部部长，后调到省人大工作）。他们很关心改革的进展，我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不会改变的，改革的大方向无法扭转，再等等吧。”在湖南调研期间，我重点考察了株洲和湘乡的环境污染状况和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我在调研报告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株洲和湘乡两地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环保措施落后，工业废水流入湘江或其支流，土壤受工业污染严重，生长出来的庄稼和蔬菜不符合标准，饮用湘江水的居

民也有中毒现象。1988年以后，湖南省环境保护部门听取人民意见，开始注意这一问题，情况稍有好转，但与环保目标还有一定距离，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治理。熊清泉和黄道奇两位同志问我：“你怎么对环境保护有这么大的积极性？”我说，1988年宋健同志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他聘我为该委员会的顾问，这样，我就分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环境保护问题了。

1989年10月的湘中之行，我留下了一首七绝和一首《调笑令》，以作为纪念。

七绝

又到长沙，住蓉园

一九八九年

去去来来又一年，
草衰叶落小楼前。
春光不把蓉园恋，
听罢秋声听雨眠。

调笑令

湘中山村所见

一九八九年

秋尽，
秋尽，

秋过小溪无影。
邻村情侣相邀，
无奈激流断桥。
桥断，
桥断，
对唱山歌两岸。

词后有一小注：这首词作于湘乡。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以后，改革开放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的主题。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熊清泉书记和陈邦柱省长在湖南代表团住所找到我，要我从自己的学生中推荐一个能干的而且懂得证券市场的人到湖南工作，帮助湖南推进股份制改革。我当时就笑了，对他们说：“你们省里就有现成的人才可以用！何必到北京来找人！”他们诧异地问我：“是谁？”我说：“是北京大学经济系1978年入校的学生黄湘平。”我接着说：“他是湖南平江人，毕业后就回湖南工作，在湖南省人大法工委工作，是个处级干部，你们不妨考察一下。”熊清泉和陈邦柱一听我的介绍，马上就说：“我们怎么把黄湘平忘了呢？”但两人又说：“黄湘平在省人大工作很出色，就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道奇同志不肯放人。”他们接着对我说：“感谢你向我们推荐了黄湘平，既然他已经在湖南省人大工作了，解决问题就简单多了，一切走程序吧！”几个月后，黄湘平就调到了省政府，负责湖南省的企业上市事务。

1992年暑假期间，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政府再次请我到湖

南一些市县进行考察，重点是了解湖南一些著名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进展情况，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也就是说，这次湖南考察与1988年那次考察的一个显著区别是：1988年主要是同地方市县干部交流，解除他们对股份制改革的顾虑，而这次考察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企业，看看它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以便符合上市标准。这次考察的路线也与1988年不同，1988年是先到常德，再去沅陵、吉首、古丈、永顺，最后到张家界，而这一次是先从长沙去株洲，再去湘潭、娄底、新化、怀化、洪江、沅陵、常德，最后由长沙回北京。这一次时间较长，7月18日离京，8月6日回到北京，历时20天。黄湘平这时已由省人大调入省政府工作，他全程陪着我们。另一个与1988年那次考察不同的是，1988年没有到企业进行调研，而这次则考察了一些准备上市的企业或有计划在较近的时间内上市的企业。

在对企业的考察过程中，我了解到的一个普遍情况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一般只把改制为股份制和争取早日上市的目的定在迅速融资、大量融资方面，而很少考虑如何转变企业运行机制、如何通过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使企业的效益大大提高。我一再向企业领导人说明，改制为股份制，应当把重点放在企业运行机制方面，融资当然重要，但不能一心只看重融资，发行溢价越多越好，如果那样的话，上市以后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上企业振兴之路。

我在考察企业的过程中，多次向陪同我考察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说，在企业上市前，一定要对企业领导人进行严格的培训，培训的重点应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要学习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能越过底线，包括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道德底线是指以诚信为本，不做任何有损于诚信的事，否则会引发投资人的疑虑，对企业的名声造成重大损失，不利于企业在市场上立足。

第二，要熟悉上市公司的一套会计制度，在会计制度方面一定要真实，经得起公示，经得起查询。企业领导人如果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制度不熟悉，误以为这只是会计们才关心的事情，那就大错特错了。企业领导人通过对本企业会计工作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谨慎行事，有利于企业在上市后稳步前进。

第三，怎样使用企业上市后融到的一大笔资金，是又一个重要问题。企业领导人必须按照招股说明书去运作。这在某些已经上市的企业那里已经暴露出问题，即认为融到的资金就归企业支配，哪些领域有钱可赚就投向哪里，不按照上市前的承诺去做，结果没有不陷入困境的。要知道，不按照招股说明书上的承诺，企业领导人自行其是，则投资很可能失败，那时该怎么向投资人交代？

我对所考察的准备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说，案例教学一直是世界上各个著名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所重视的，从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中可以汲取大量有益的知识。先不说国外的案例，单单最近几年国内的上市公司，就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而且，案例不是单纯阅读的，一定要组织讨论，从讨论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二

1992年暑期我们一行在湖南进行的考察，所走的路线都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的或留下深刻印象的城镇和农村。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一路上，我留下了一些诗词，我觉得，往事很值得留恋，特别应该让孙子一辈以后读读这些诗词，让他们了解祖父一辈抗日战争期间逃难的艰难岁月。

南乡子

湖南涟源至冷水滩途中

一九九二年

远处雾茫茫，
农户新楼粉色墙。
山影几重溪水碧，
流长，
西去潺潺伴夕阳。

荷叶满池塘，
三两村童捕蝉忙。
大路尽头杨柳岸，
飘香，
叫卖声声玉米黄。

从冷水滩向西再折向西南，雪峰山挡在前面，就像一排屏风挡在路中，公路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修成的。我们在雪峰山东侧的龙潭镇休息了一下，在农家吃了午餐。龙潭镇，1945年春湘西会战的战场之一。我那时正在沅陵读初中，距离湘西会战主战场不过一百多公里。国军英勇抗敌，取得胜利，日寇企图侵占湘西的计划落空了。记得捷报传到沅陵之时，老百姓都在街头聚集，放鞭炮庆祝。

木兰花

雪峰山下龙潭镇，1945年春湘西会战歼敌处

一九九二年

青松云海峰峦叠，
记得当年鏖战捷。
军刀飞舞敌心寒，
鼓角震天山欲裂。

草丛遍洒英雄血，
寄语宝岛情切切。
老兵何不速归来，
墙上弹痕犹未灭。

汽车翻过雪峰山就是怀化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逃难到湘南时，坐长途客车翻越雪峰山后，到沅江边上的安江镇换上木船，顺沅水而下，到达沅陵。当

时还没有怀化市，记得那时是一个小镇，名叫榆树湾。而现在（1992年），怀化市不仅建成了，还是地委和专署所在地。记得抗战时，沅陵是专署所在地，自从怀化设立专署后，沅陵就划归怀化专署管辖了。

在怀化市住下，我们一行特地到芷江参观。在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牌坊值得一看。

七律

湖南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牌坊

一九九二年

今日有缘返故城，
当年情景又重生。
路人相遇传佳讯，
陋巷通宵爆竹声。
游子漫吟工部句，
乡亲难禁泪珠横。
休谈往事随风去，
血字牌坊血砌成。

诗后有一小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作者正在沅陵。当时的狂欢情景，至今尚在脑海之中。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牌坊，外形像一“血”字。

从芷江出发，我们去了洪江。途中经过黔城，这是唐朝诗人王昌龄贬官之地，唐朝黔城名龙标。王昌龄七绝《芙蓉

楼送辛渐》如下：“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如今的芙蓉楼已重修。王昌龄擅长七绝，我从少年起，就爱读王昌龄的诗。

在芙蓉楼上，我题了一首《菩萨蛮》。

菩萨蛮

湖南黔城芙蓉楼，楼前有碑，上刻王昌龄诗

一九九二年

芙蓉楼外春来早，
芙蓉楼下多芳草。
不信楚山孤，
长吟醉玉壶。

东流沅水急，
两岸崖如壁。
随处有知音，
念君一片心。

从怀化市到沅陵走的是湘黔公路和川湘公路，这两条公路都是抗战期间民工修建的，我曾坐长途客车经过几次，现在重新走这两条公路，路面拓宽了，也铺上了柏油。从怀化市到三角坪走的是湘黔公路，从三角坪到沅陵走的是川湘公路。在湘黔公路段，我们经过辰溪县，停车参观了市容。当年，城内全是石板路的小街小巷，根本行驶不了汽车。现

在不仅盖了一些高楼，而且有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汽车在大街上行驶。在沅江边上，我向江中望去，有小轮船停泊和航行，这与我们家逃难时坐小木船顺沅江而下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辰溪县我填了一首《菩萨蛮》。

菩萨蛮

循湘黔公路和川湘公路到沅陵

一九九二年

回乡犹走当年路，
因何不见当年树？
老树旧人栽，
新人伐树来。

山区修路累，
洒满前人泪。
险阻早开通，
谁怀筑路工？

很凑巧，我的二弟厉以京夫妇正在张家界游览，他们知道我和妻子何玉春要从怀化市去沅陵，就与我们约定在沅陵相聚。以京此时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家住广州。兄弟二人能在沅陵相聚，是很难得的。

在沅陵，我特地填了一首《江城子》。

江城子

再回沅陵城

（五强溪水电站建成后，沅陵城将被淹没，以京弟约我同返湘西）

一九九二年

山城一别几多秋，
少年游，梦中留。
为觅旧踪，相约返辰州。
漫步长街河岸去，
春尚在，柳枝头。

瞬间高坝截江流，
水悠悠，好行舟。
淹没关厢，岭上有芳洲。
昔日繁华将再现，
云起处，尽新楼。

在沅陵期间，沿沅江支流酉水而上，走的是永顺古道。永顺古道在酉水左岸修建，路是石板铺成的，只能两人并行，途中每隔不远就有一座茶亭，有农民在亭旁砌一炉灶，卖茶和一些土特产，茶亭供来往行人休息。我在沅陵读初中时就曾经永顺古道由城区赴学校，据说当年被贬到永顺、保靖、古丈、龙山等地的官员也都必须经过这条永顺古道。

在茶亭休息时，我填了一首《渔歌子》。

渔歌子

沅陵永顺古道上茶亭

一九九二年

古道桥头歇脚亭，
贬官当日带愁行。
溪水急，
草山青，
晚风低诉旧时情。

循永顺古道再往西北方向走去，到了沅陵乌宿。乌宿属沅陵二酉苗族自治乡，这里居住着许多苗族同胞。乌宿是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集镇，有青石板铺成的街道，街旁有一些小店铺出售苗族服饰。二酉是酉水右岸一座山的山名，“二酉藏书洞”是当地的名胜古迹。据传，秦始皇焚书坑儒，当时有识之士为保存古籍，将大批竹简藏在二酉山顶的洞穴内，躲过一劫。时间久了，竹简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已粘在一起，字迹也难以辨认，“二酉藏书”一词一直流传至今。

在沅陵乌宿，我写了一首《七绝·沅陵乌宿》。

七绝

沅陵乌宿

一九九二年

摆渡小舟泊浅沙，
石街两侧旧人家。
依稀犹记当年路，
只是油桐落尽花。

这首诗后来被收进了《厉以宁诗词选集》，由商务印书馆于2008年出版。在《厉以宁诗词选集》中，这首七绝的后面，我加了一个小注：“作者在沅陵读初中，春假时来过乌宿（1944年），至此（1992年）已经48年。2005年，作者夫妇和家人在此捐建了一座九年制寄宿学校，名宗琳学校（厉以宁的母亲名袁是琳，何玉春的母亲名刘宗英，从两位老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学校的名称）。”

离开沅陵乌宿后，我们经常德、长沙就回北京了。在长沙，我同熊清泉、黄道奇和刘正三位老友做了详谈。我的建议是，湖南的股份制改革已经启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都很高，这是好事。今后，应当稳步推开，不要贪图多上、快上。应当牢记一句话：水到渠成。只图快不会给湖南带来实际利益。

三

1993年5月2日，宋健同志作为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在杭州西湖国宾馆召开环境保护会议，会务组通知我出席，因为我仍然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一职。同时，在新建立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我被任命为中方委员兼环境经济工作组组长。环境经济工作组原来的名称是资源核算与价格政策专家工作组，我担任中方组长，外方组长是世界银行专家、英国的沃尔福德（J. Warford）教授。这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属的六个工作组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组。后来，名称才改为环境经济工作组。

资源核算与价格政策专家工作组（环境经济工作组）的中方专家有王恩涌、陈良焜、王其文、李金昌、雷明、张世秋、章铮、武亚军、崔成、刘少成、宇文新、任勇、王新、冯东方等教授、副教授。在国内，这支研究队伍相当强大。外方专家有来自美国的斯波福德（W. Spofford）和帕纳约托（T. Panayotou）教授，来自挪威的汉森（S. Hansen）教授。

资源核算与价格政策专家工作组所研究的领域较多，大体包括以下项目：

（1）中国水资源定价与价格政策。

①长期缺水地区水资源定价。

②北京水资源定价。

③丰水区水资源定价。

(2) 中国煤炭资源定价与价格政策。

①煤炭资源开采的机会成本及原煤定价。

②大同矿务局坑口原煤的资源定价。

③中国煤炭定价的政策。

(3) 中国原木定价与价格政策。

①原木定价的案例研究。

②中国木材生产价格政策。

③中国木材生产的宏观政策建议。

(4) 中国城市交通工具结构的优化战略和定价政策。

①各种城市交通工具运输的边际机会成本研究。

②城市中各种交通工具的发展方向。

③影响成本—效益的主要因素和解决方式。

④调控人们交通需求的经济手段和相关政策。

⑤深圳特区各种交通工具的边际机会成本和发展方向的案例分析。

(5) 资源—经济一体化核算研究。

①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②资源—经济账户核算。

③资源—经济投入产出核算。

④基于存量核算思考的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研究花了我们这个工作组大约5年的时间。最终成果是《中国自然资源定价研究》一书，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12月出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编）。

四

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担任中方委员，并兼任资源核算与价格政策专家工作组（后改名为环境经济工作组）中方组长一职，进行课题研究，的确占用了我不少时间。但我认为：第一，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资源合理使用确实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我国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是责无旁贷的。第二，承担这一课题的主力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专业学院，我们既然承担了这一课题，就一定要把研究工作做好，为学校争光。第三，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资源合理使用对我来说，是新研究领域、新课题，从而也是学习机会。我这时仍担任着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陈良焜教授、王恩涌教授仍兼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我们将一起组织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的研究生参与环境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这样，我从1993年起就把环境经济学作为除证券法起草之外的又一项重点科研任务。好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年轻教师雷明、章铮、武亚军都是我的学生，我准备让他们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内，在个人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成绩。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不仅需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收集数据，而且需要到全国各地去调研、考察。好在调研、考察



① 2012年8月，厉以宁在陕西安康调研。

的经费是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的，在各地召开环境经济讨论会的费用也有着落，所以研究工作的开展比较顺利。

1994年，我和同事们首先在河南省考察了黄泛区的生态状况。黄泛区的名称来自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5月，徐州被国军放弃，国军退守河南。日军占领徐州后，分兵进入河南境内，国军无险可守，形势危急。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秘密决定炸开黄河大堤，阻止日军西进和南进。原定6月4日在河南中牟县境内掘堤，当天午夜放水，但掘了三天三夜仍水流不畅，挡不住日军攻势。6月5日，日军攻占开封。于是国军改在花园口炸堤，决口长达370米，导致黄河水夺堤而出，洪水淹没了豫东17个县，数

十万居民成为浮尸，140万灾民无家可归。黄河水淹之土地日后被称为黄泛区。

从1938年到1994年56年过去了，黄泛区始终没有恢复水淹前的状况。我们由郑州到开封，再由开封南下，经尉氏、鄢陵、扶沟、西华抵达周口市，一路上看到的村庄仍是破破烂烂的，小集镇也很萧条。主要原因是这一带是农业区，而农业区的繁盛首先归因于土壤肥沃和水源充足，但这一带都是黄泛区。地面覆盖了当年水淹时留下的荒沙，土地贫瘠，庄稼长不好，且这一带严重缺水，水利灌溉工程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再加上农村劳动力不足。为什么农村劳动力不足呢？据当地人告知，因为农业收成不好，农民穷困，无法维持生活，只得外出务工。农民没有技术，外出打工只能凭



① 厉以宁在黄泛区调研。

体力挣钱，当粗工、搬运工，在建筑工地上干体力活，收入低，但即使如此，也比在农村好些。

考察以后，我们感到黄泛区的振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同周口市干部座谈，以及回到郑州向河南省农委汇报时，我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黄泛区原来就有国有农场的设置，但一方面体制还不顺，另一方面经费不足，所以要振兴黄泛区经济，首先黄泛区国有农场的体制需要改革，这样既可以调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又有助于把社会上的资本引入黄泛区进行建设。至于什么样的体制适合黄泛区，我建议采取股份制方式，政企分开，让农民成为股东之一，即把股份合作形式移植到黄泛区来。否则，像目前这样，农村中的农民同黄泛区国有农场是不和谐的，农民总把国有农场看成“异己的机构”，动不动就说：“你们耕的农田原来不就是我们的土地吗？”这种不和谐的情绪是不利于黄泛区振兴的。

第二，一定要重视黄泛区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经费要充足，要让黄泛区的广大农民认识到这可以使国有农场和广大农民都从中受益。由于我本人是经济学家，对于如何建设水利灌溉工程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我设想，如果用股份制形式来建立一个水利灌溉公司，使它的投资主体明确，股权明晰，让农民以劳力入股，享受分红或水价折扣，是不是更有效？况且，这也是促进黄泛区国有农场同广大农民走向和谐、融洽的一项措施。

第三，从长远来看，黄泛区应当把生态建设放在首位。如今黄泛区农民不愿意务农是有原因的。土壤这么贫瘠，农

民收入低，为了增产，多用化肥，但化肥使用多了，土壤质量不就更坏了吗？农民收入少就纷纷外出打工，而且以打粗工为主，这样下去，农村建设靠谁？留在村里的，无非就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了。有些妇女也外出打工了，孩子迟早也会出去，这样，农村不就成了老人村了吗？可见，要振兴黄泛区，生态建设是本，而生态建设既需要资金，又需要技术。这都是河南省政府要统筹安排的问题。

五

到黄泛区考察前，我们先到了开封。郑州和开封之间，汽车在中牟县官渡之战遗址停了下来。陪伴我们的郑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东汉末年袁绍盘踞河北、山西，势力很大，兵多将广，再加上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旧遍天下，而曹操兵少，两军隔黄河对峙，曹军处于劣势。但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把袁绍击败。袁绍退守冀州，从此难以恢复元气，最后为曹操所灭。

我们下汽车观看，从地势上看，官渡之战遗址没有什么特色。但袁绍之败，看来是必然的，因为史书记载，袁绍好谋无断，多疑偏信，必败无疑。

为此，我填了一首《秋波媚》。

秋波媚

官渡之战遗址

一九九四年

挥师南下气如虹，
朝野震惊中。
袁家声势，
门生故旧，
四世三公。

人和既失犹言战，
霸业必成空。
好谋无断，
多疑偏信，
能不途穷？

到了开封，在北宋遗址参观后，有感于亡国之君宋徽宗的生平和下场，不禁又填了一首《踏莎行》。

踏莎行

河南开封怀古

一九九四年

歌舞青楼，
花灯闹市，

坊间笔走龙蛇字。
易装巡幸自风流，
满朝谁问出燕事？

塞草荒沙，
恍然隔世，
囚车受辱千秋址。
观天坐井悔无穷，
当初何不疆场死？

世界上最不可救的事情就是权力加无知。作为大宋皇帝，宋徽宗的权力已是最大，真是一言九鼎，为所欲为。但权力无限，再加上个人无知，那就什么样的荒唐事，都做得出来。无知不等于没有学问。宋徽宗书法好，画也画得不错，还会填词，宋词选集经常选入宋徽宗的那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但他却是最无知的人。他任用奸人高俅、童贯自不必说，就拿一件小事也足以说明他的无知。宋徽宗属狗，所以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全国不准屠狗和吃狗肉。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吃狗肉的习惯，宋徽宗属狗就不让百姓吃狗肉，老百姓岂不骂死他？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是皇帝嘛！北宋终于在他手中灭亡了。

被俘的两位北宋皇帝，一个是宋徽宗，他已退位，被俘时是太上皇，另一个是他的儿子宋钦宗。宋钦宗当上皇帝不久，两人同被押送到金国境内，囚禁于距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不远的一座房屋内，周围都是山，关押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的房屋在山间的一块平地上，这就是“坐井观天”。

ACADEMIC
AUTOBIOGRAPHY
OF LI
YINING

厉以宁 学术 自传

厉以宁◎著

SPU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晶

责任校对：李玉娴 谢善德

责任技编：陆俊帆

封面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逸 QQ:34458193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上架建议：中国经济
ISBN 978-7-5454-6815-1
9 787545 468151 >
定价：88.00元